

中国哲学史

研究系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

人性

论史

姜国柱 朱葵菊 著

中国哲学史

研究系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

人性

论史

姜国柱 朱葵菊 著

## 中国人性论史

姜国柱 朱葵菊 著 责任编辑 李自强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解放军测绘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21.625 字数 500 000

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 7-215-03747-9/B·64 定价 38.00元

## 导 论

人、人生、人性的问题，是人类思想史、认识史上最为重大的问题，一直是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所极为重视、精心思考、着力研究的一个重大的课题，也是众说纷纭、歧义甚多、辩争激烈的一个重大论题。

人是宇宙间最伟大的生命，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人，都是为了人。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部门和科学的发明、创造；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门类和思想的创立、发展，都是人之所思、所论、所为的结果，都是为了人、服务于人的。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亦都是人。几千年来，人们所求索、虑知、论辩的核心、永恒的主题，就是人。只要有人类存在，它就永远是人们探究不完、议论不止的中心课题。所以人的问题，是一个伟大而常新的永恒课题。

有了人，便有人生问题，人生是随人而来的。人的一切活动及其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延续、繁衍、发展。在原始人的最初阶段，人的思维极为简单低下，超出动物界不多，以至把自己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分开。伴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认识力的增强，人们开始思考自己同自然界的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人自身肉体组织的关系等等。人从会劳动那天起，人类始祖便迈出了关键的第一

步——从猿转变到人，这是历史性的质变和突破。从此，人超出动物而优于动物。从自然的野蛮的人，再进化到能思考各种问题的人，“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人产生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之间的关系，人生理想、价值及人生的种种问题，便应运而生。人生论与宇宙论紧密相关，同样古老。所以人生的问题，亦是一个伟大而常新的问题。

有了人、人生，便有人性问题。“性”字从心从生，有人生、人心，就有人性，无人生、人心，便无人性可言，“性”字之义，正是如此。中国古代先圣先哲称天、地、人为三界、三才，为万物之本；而“性”来自天，“心”本乎地，“人”生于人，这就是“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亦即“性”是上天所赋，“心”来自大地，“人”是父母所生。人应当重人生、有人心、讲人性，不如此，不可以为人。所以人性与人、人生问题，密切相连，融为一体，亦是一个伟大而常新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以后，人、人生、人性问题，便吸引着许许多多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的注意力，使他们进行着经年累月的艰苦探素、缜思密察，以至耗尽了他们的全部心血和毕生精力。正因为如此，人、人生、人性问题，时间之久远，内容之丰富，蕴义之深刻，层面之多广，思想之复杂，学派之林立，见解之精微，都是其他任何问题所无法比拟的。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尤其如此。

我们知道，在世界文明发展的三大思想文化系统——中国文化、希腊文化、中东文化中，尽管其思想纷呈，观点各异，内容丰富，难以概论，但就其主要思想倾向比较而言，则应概括出这样的特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重人和人的关系，希腊古代文化注重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东思想文化注重人和神的关系。由此延伸而来的思想文化便是：中国的人际关系学发达，西方的自然科

学发达，中东的诸神之学发达。虽然这样，但却必须看到，不论就其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来说，还是就其注重人与其他客体的关系而言，都有人在其中，都离不开人，都以人为中心、为主体。如果离开人这个中心、主体、主导，则其他一切都不复存在，亦无从谈起。在这里进一步证明人、人生、人性问题的永恒性、重要性。

我们必须看到，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从古到今，从圣贤到百姓，从士人到官吏，从帝王到庶民，从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到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等，无不注重人、人生、人性，讲究做人之道、为人之方、成人之路。其结果，则使中国人不论生活在哪个历史时代，处在何种生活境遇，都时时注意爱人修己，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讲信修睦，和睦相处，和谐共荣，既要独善其身，又要兼善天下。这些思想文化与传统道德，都与中国的先贤们重人、人生、人性的思想直接相关，这些思想、道德对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素质、民族品格，亦即对形成中国人的人格、国格、尊严、节操、风骨等，都起着重大的决定性的作用，并使中国成为文明古国、礼义之邦。

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中国古代各家各派学者及各种不同阶层的人物，对人、人生、人性问题的关注，而使中国有关人的学说，内容丰富，思想宏大，蕴义深邃，体系完整，地位重要。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等，其所思所论、所议所著，有三分之二的内容、篇幅，都是有关人、人生、人性的问题，这是中国哲学思想、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和优点。世界上有关人、人生、人性的理论，就其丰富性、广泛性、深刻性、系统性而言，当以中国为最。

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必须注意这个显著的

特点和优点，综合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的诸因素、诸条件，加以考察、分析有关人、人生、人性的理论。每个历史时代有关人的学说，从问题的提出，范畴的确立，争论的展开，到理论的深入，新说的创立，旧说的完善，思想的结论，都形成一个首尾相衔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一个认识的圆圈，由这些圆圈组织而成的大圆圈，便形成了一个内容极为丰富，思想纷繁复杂的中国人学理论发展史。

在丰富多采，宏大深刻，体系庞大，结构严整的中国人学理论发展史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到：中国历代的先哲先贤，在探讨、研究人的种种问题中，主要是围绕以下诸问题进行的，诸如：人与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性善与恶的关系，人生理想，人生价值，人生目的，人伦道德及生与死的关系等等。在人生理论诸问题的探讨、争论、研究中，人性问题——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则属于主导、核心地位。中国的先哲先贤们，其所以高度重视人性问题，就因为在他们看来，研究、探索人性问题，旨在揭示人的本性、本质是什么及人性善恶的根源、表现，说明人应当如何生活及如何生活才算是幸福、愉快、有价值、有意义，告诉人们只有按照人的本性、符合人的本质有规律、有道德、有秩序、有目的地生活，为善去恶，变恶为善，修养自己，爱人行仁，人的生活才会幸福、愉快，人的生命才有价值、有意义，人生的目的才能达到、实现。由于人性问题，与人生、人伦、人道、个人品格、社会公德，乃至政治主张、政治理想等问题，紧密相关。并成为道德规范、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思想根源。所以中国古代的先哲先贤们，一开始就把人性问题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并成为中国历代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向世人展现其纷繁复杂，博大精深思想内容和中华民族的崇高品格、知识智慧。

在中国古代瑰宝奇异的思想发展的长廊中，如果我们仔细地

阅读，冷静地思考，精心地研究，便可以看到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各个不同学派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对人性问题所作的艰苦、缜密的理论探究和论证。有些思想观点、理论论证，在今天看来，尽管有其偏颇、不确、失足、失误之处，但在当时并非是无道理、无缘由的荒诞呓语，而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亦是认识真理、探求真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认识阶段。因此，我们对于历史上的人性理论的研究，应当采取冷静深思、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具体地分析、评论，不应当统统视为“封建糟粕”，加以挾伐、抛弃，当然亦不应当统统视为“国宝国粹”，加以颂扬、膜拜，要分清“精华”与“糟粕”，做到合理的去取、扬弃。在批判、否定、排斥了几十年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之后的今天，更应当采取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分析的方法，来对待这一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这是良知的呼唤，学者的责任。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宗旨、责任，来研究、撰著这部《中国人性论史》的。

人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是人生哲学求索和论析的最高目的和终极目标。因此，关于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本质及其属性等问题，一直为古今中外智慧大师们所关注和思考，尤其是中国先哲先贤们殚精竭力、呕心探索这一问题，并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有人说“心、性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髓”，这话是有道理的。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发展的长河中，哲学家们在说明千变万化的宇宙现象、自然事物的同时，总是想揭示人自身的神妙无穷的奥秘，以求发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因而对人性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论证、界定，并使之歧义很多，学说纷繁，学派林立。“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奇怪现象：易于知彼而难能知己，远的倒可看清，近的反为难辨。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人的面孔，可以照见高山、大川，偏偏照不见自己；一个探照灯，左



右回旋，前后翻转，六合八面无不可探，偏偏难以照亮本身。人类居世几百万年，宇宙之表、原子之理，探究到了多少真谛，可是对自己的本性还在那里众说纷纭。不过这一领域却不像镜子和探照灯那样自身不可反照，智慧大师们立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借助时代的科学和思维，一层一层地向深处剥去。”（王德有：《智慧论》《人性篇》，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174页）因为人性是一个极为复杂，又难说清的问题，所以许多哲人智士虽然穷经皓首，冥思苦想，探幽阐微，但是却愈论愈不能一统，愈求愈不得其解。直到中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则把人性视为超乎人的知识之外的领域，而认为是不可知的。他说：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就人性问题讨论、争论了二千多年，究竟谁是谁非，孰对孰错，还弄不清楚，“古今东西之论性，未有不自相矛盾者。使性之为物如数及空间之性质，然吾人之知之也既确，而其言之也无不不同，则吾人虽昌言有论人性之权利可也。试问吾人果有此权利否？今论人性者之反对矛盾如此，则性之为物，固不能不视为超乎吾人之知识外也。”《论性》王国维以中外历史上论人性的不同观点，相互矛盾，自相矛盾的种种说法，证明人性问题不像二加二等于四，两点之间只能引一条直线那样确实，他从人性的不确实性、复杂性出发，断定人性为超乎人的知识、认识之外的范畴，故把人性划为不可知的彼岸性领域，并宣示他研究人性的宗旨是“使后之学者勿徒为此无益之议论也”。（《论性》）以王国维的知识、智慧、才能、成就、贡献，对人性问题，而有此见，说明人性的复杂、难解。然而，复杂、难解，并非不可知、不可解、不能知、不能解。历史上的哲学家、思想家，就人性问题的所思、所议、所论、所著的本身而言，就是一种知、一种解，至于其知、其解的深浅，对错与否，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发掘、研究、深化。故王国维此论虽说明人性问题的复杂性，但亦说明其

理论的偏颇性。我们应当沿着先哲智士们的思维路径继续前进,向深处走去,以发掘他们的“潜德幽光”,并力求做到“古为今用”。

在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史中,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学派学术思想的创立、发展、流变,都是在争鸣中相互补充,在对立中相互融合,在斗争中求得发展的。各家各派之间,既批评对方的缺点,又吸取对方的长处,既互争雄长,又共同前进,既揭露对方之短,又纠正自己之短,这种在对立、吸取、求索、修补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性理论,确实是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底蕴深厚。

“人性”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的观念中,其涵义是多种的,其范围是深广的,有的是指人的自然资质、属性,生而具有,不学而知,不虑而能的本能欲望,得于天而具于心的先天本性,即“生之谓性”,饮食男女之性;有的是指人异于禽兽、优于禽兽的意识活动,道德属性,理性能力,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人峻极于天”的崇高、伟大的质性,即“性善”或“性恶”之性;有的是指人赖以形成生命,体现天命、天理的根本属性和成圣、成佛的根本依据,即“性即气也”、“性即理也”和“性各自有,不待因缘”之性;有的是指人的主观精神、主体意识、思想活动,即“性即心也”和“心性一也”之性;有的是指人的后天环境习染、学习求知、道德教化而形成的思想品格、知识能力,即“性日生日成”、“心知即性”之性,等等。概括起来说,“人性”主要包括这样两种涵义或两个层次:一是人类具有的各种属性,二是人类特有的具体属性。前者包括人类所有的各种属性,即自然属性,有与其他物类相同的,也有与其他物类不同的,“一滚而论之”者;后者是专指人类所独具的而所以区别于其他物类的特殊属性,“人优于动物”者。中国古代的先哲先贤,虽然对人性的两种涵义或两个层次,有所论及、有所区别,但是却没有严格区分、着力

研究，他们所关心、所着力的问题，则是比较笼统地说明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依据是什么，即人的本质、本性问题，故他们对此语焉而详，论焉而精。

人性问题，与人生问题息息相关。中国哲学的中心论题是人生问题，而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因此以儒家人性论为主导，以儒、道、释人性思想共济互补的中国人性理论则显出其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对于这样一个丰富多采，博大精深，多而复杂的重大理论问题，就我们个人能力、水平而言，实在力不能及、难于驾驭。当然，我们知道，做任何事情都是不容易的，而写作《中国人性论史》，全面地、系统地描述中国几千年的人性理论发展轨迹，正确地、科学地阐发其思想要旨、理论贡献，对我们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再加上近几十年来，一谈到历史上的人性论，便常常视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而加以口诛笔伐，排斥否定，缺乏冷静思考，科学分析，当然，更谈不上吸取扬弃，合理去取，致使人生哲学，人性学说成了学术研究者很少涉足的领域，甚至是“禁区”，这亦给本来就复杂难言的人性理论的研究，增加了难度和风险。所以中国学界全面、系统、深入阐发中国人性论史方面的专著，实在鲜见。不过我们知道，做任何事情要想有所收获、成功，就必须知难而上，知难而进，不断拼搏，勇于攀登。如果知难而退，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便会一事无成。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中国人性理论发展史的研究，早有准备和积累，并有《论人·人性》、《中国历史上的人性论》两本著作问世。近几年来，我们在教学之余，研究中国哲学其他问题的同时，依然继续留心着力，仔细思考中国古代人性理论问题，在原有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排比爬梳，将中国古代先哲先贤的人性理论，依其主要思想观点，基本理论倾向，分成

若干个论题，依次进行分析论述，以求观点醒目，脉络清晰，使读者以这些专题为线索，对中国人性理论发展史有一个横面的了解和认识。

对于中国人性理论的横面研究，有利于我们把握中国人性思想的各种派别和观点。要对这些派别和观点作更加深入的研究，还必须循着中国历史发展时期，对它们作纵向的分析。在这里我们以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为序，对中国人性理论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作一个总的论述。同时还将从比较的角度，对中国与西方的人性理论作些分析，从中窥视中西人性理论的异同、优势、短长，以使读者了解和认识人类人性理论的主要内容、主要成果，显现东西方人性论、人生观、价值观的一致处和差异点。

中国人性理论发展，按照历史时期，似可划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一）先秦：人性理论之发端——人性善恶的论证；（二）汉唐：人性理论之展开——性三品说的提出；（三）宋元：人性理论之发展——人性二元论的创立；（四）明清：人性理论之深化——人性诸论的综合；（五）近代：人性理论之余绪——古代人性论的衰微。下面依次论述。

### （一）先秦：人性理论之发端——人性善恶的论证

中国人性理论与其他思想理论一样，发轫于先秦时期。“人性”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最早提出和最为注意的一个问题。远在《诗经》和《书经》中，就出现了“人”和“性”的记载，那时虽然没有把这两个字连用，所讲的“人”是指人生，“性”是指天性，但是却说明人们对人生、天性已经开始注意，并为这两个字的连用创造了条件。当时智者们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天为人所由的根源，所趋的宗向，所法的原则，人离不开天，人不可违天，所以称为天人，这就是“一天人”之义。这时人性还没有作为哲学、伦理范畴而提出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伴

随社会形态的急剧转变，社会政治的剧烈动荡，社会思想的空前活跃，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

在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中，人性问题便提到哲学家、思想家的争论日程，并作为一个中心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各家各派围绕人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出了具体的论证，而他们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人性善与恶及其来源问题。从这一历史时期的人性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关人性善恶的一些观点，基本上都提出来了，并进行了辩论和争鸣，为以后人性理论的发展，首开其端。从此以后演出了许许多多，高潮迭起的不同剧目，在人类的认识史论上、人性论史上写出了许许多多，丰富多采的光辉篇章，从中显现出中华民族的聪明睿智和崇高品格。

先秦时期的智者贤人，其所以就人性善恶问题，展开如此激烈的争论，是有其社会动因的。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在这个变革时期，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大变革相适应，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使古代哲学思想文化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春秋介于西周和战国之间，它打破了西周时期的停滞局面，使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领域开始动荡、发展起来，但又不不如战国时期那样喧闹沸腾，变化剧烈。因此，在思想领域中出现了传统与革新、信仰与理性、天与人、神与民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局面，并显示出过渡性质和特点，这种过渡性质和特点，主要表现是：天人观的改铸，即由夏商、周初的崇天、颂天、拜天的天神观，而走向疑天、怨天、恨天的变化；随着天神观的变化，促使了无神论的勃兴，辩证法的发展，人性论的提出，道德观的修补等一系列思想发展变化，这一系列思想发展变化标志着中国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和创造性。

春秋时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准备了思想条件，一个伟大时代为另一个新的伟大时代的到来拉开了序幕。

春秋时期造就了许许多多的伟大历史人物，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则是春秋末年的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孔子，伟大的军事家孙子。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为另一个新的伟大时代的到来，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继春秋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领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光辉一页，并为后来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的转变——奴隶制的崩溃、封建制的确立，在这个大变动时期，诸侯争战，群雄争霸，相互兼并，杀人盈野。“春秋无义战”，战国尤其甚。这种社会政治、经济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反映在哲学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则是诸家蜂起，学派林立，即学派的多样性，观点的多元性。所谓“百家争鸣”，是形容、溢美而已，实则没有“百家”，而为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杂、农、小说诸家。虽为“十家”，形容为“百家”，但也突显出战国时代哲学思想战线的丰富性、深刻性。因为时代需要人才，造就人才，为人才提供表演的场所、舞台，人才适应历史需要，应运而生，亦要在历史舞台上表演，所以这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造就了一大批各种人才，而这一大批人才，又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使中国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进入了一个思想纷呈、群星灿烂的时代。

在这个思想空前活跃和繁荣的时代，各家各派学者为了解决社会矛盾，在人生哲理和人性论方面提了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主

要围绕着：天人之辨、人神之辨、形神之辨、名实之辨、心物之辨、知行之辨、常变之辨、经权之辨、古今之辨、礼法之辨、善恶之辨、义利之辨等等，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形成了各个主要思想派别和学术观点。

战国时期是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的发祥期和繁荣期，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文化成就，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并为以后两千多年的哲学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个时期，各个国家、阶级、阶层都涌现出自己的思想代表，为本国家、阶级、阶层、集团立论、呐喊，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都企图以自己的思想面貌来认识世界，说明世界。

在“百家争鸣”中，由于各家思想观点尖锐对立而相互攻讦，相互诘难，故有显学之争；本家内部亦因观点不同而发生诘难、论辩，从而使学派分化，故有“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韩非子·显学》）等情况发生。但是，对立的各家，在争论、攻讦、诘难中，又吸取对方的思想，在攻讦中融合，在相异中求同，往往是攻击某派学说最力者，其受该派学说影响最深。正因为这样，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并为人类的文化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在这个哲学思想发展的辉煌时期，作为中国哲学思想核心的人性理论，当然为各家各派所关注、所着力，作为一个普遍的问题。他们对之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争论的中心则是人性的善与恶及其来源问题。

孔子是我国先秦时期最早提出人性理论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很少言性，全部《论语》，只有这一处讲性，所以他的门人子弟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阐也。”（《论语·公冶长》）孔子对人性善恶并没有言及，“性相近”是善相近，还是恶相近？“习

相远”是善相远，还是恶相远？孔子都没有作具体的说明，这只能说人的天性是“相近”的，由于后天的环境习染和教育习惯的不同，而使人性差别“相远”了。孔子虽然很少议论人性，更没讲论人性善恶，但是他的有关言论、思想，却寓意深刻，发人深省，并为后人的引申、发挥留有余地，而具有发端意义。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命题，就蕴涵着善与恶的萌芽。“性相近”思想为孟子所阐发，而开了性善论之端。孟子认为：人的先天本性是善的，其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人人都有一颗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所有的人都同具的、相近的善心，由此天赋人心之善，可以证明人性之善。据此，孟子具体地阐扬了“性相近”的思想，而建立了人性善论。“习相远”思想为荀子所阐发，而开了性恶论之端。荀子认为：人的先天本性是恶的，由于后天教育可以使人由恶变善，去恶为善，所以“人之性恶”与“化性起伪”就构成了荀子的人性理论。人性由恶经过教化而变为善，正是“习相远”的证明，荀子全面阐扬了“习相远”的思想，建立了人性恶的理论。

孔子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等思想言论，则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论、性善情恶论，提供了思想的诱因、前提。既然人分为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知之者，困而不学者；中人以上、中人、中人以下者；上智、中人、下愚者等不同品级，而生知、上智、中人以上者为君子、善人，困而不学、下愚、中人以下者为小人、恶人，那么处于其中的大多数的中人，则为性善恶混者了。生知、上智、中人以上之人尚理性、本性善；困而不学、下愚、中人以下之人多情欲、情为恶，故要去情欲，复天理。



归于善。因此，孔子的人性理论，虽然没有具体的展开、解释，但却为后人留下了引申、发挥的余地，而具有发端意义，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孔子之所以对人性问题没有展开论述，还有其社会原因。春秋末年，哲学思想领域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所以哲学家、思想家深究、详论的是“天人之际”，所以，孔子对人性理论语焉而不详。

到了战国时期，尤其战国中期以后，人和人性问题，逐渐被提到哲学家、思想家争论的日程上来。在争论中，提出了种种不同的人性观点。总观战国中期的人性理论，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

老子、文子、庄子的人性自然论，实则为超善恶论，或绝对的性善论。道家学者崇尚自然，认为人性任自然、法自然，不加工、不造作，才是最好的状态，顺从自然之性，便可达到人生的最理想境界，从而完善美好人生。

告子的性无善恶论。告子认为：人的原初本性，既非善亦非恶，本无善恶可言，所以说“性无善无不善也”（《孟子·告子上》），“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同上）的人和动物共同具备的自然属性，是没有善恶的，善恶是后天才有的。

世硕的人性有善有恶论。世硕在中国人性论史上最早提出人性有善有恶论，他“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论衡·本性》）。这是说，人生来具有“善”与“恶”两种不同的自然质性，如同“气”有“阴”与“阳”之分一样，“人性”有“善”与“恶”的不同，阳气表现为善，阴气表现为恶，故人性有善有恶。

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论。孔子虽未明言善相近、相远，还是恶相近、相远，但却包涵此义，而为后人留下解释的余